

第一部分

# 蒙太奇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東方紅》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版權所有

## 1. 革命奠基人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卓著的聲望不是一下子就贏得的。他是在1935年著名的遵義會議期間得以參與領導，但直到1942年，在經歷七年的思想妥協和政治變動之後，他和他的思想才獨領風騷，支配了全黨。<sup>1</sup> 然而，為他作傳的人卻將他理想化了，描繪出一幅非常富有戲劇性的圖景：他作為一個有預見性的革命家，對通向勝利的唯一道路抱有堅定的看法，這使他擊敗了其他競爭對手，獲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列寧也許因他能夠按照形勢的需要作出讓步並調整個人信念而備受稱頌，毛澤東則由於堅信他個人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動力有一種可靠的直覺而為人讚揚。

毛澤東早期的實用主義是造就他這種剛直的特殊形象的原因之一。他主張的策略——1927年依靠農民的激進主義、1933年期間的游擊戰和1935年北上抗日的決定——總是與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及第三國際的指示相抵牾。雖然毛澤東從未死守這些教條，也未獨立地發展它們，但他確實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早地認識到，革命應從農村開始，紅軍既要注意作戰，又要注意發動農民群眾。

於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成為毛擺脫在野地位，擺脫在黨內的政見孤立和在延安黃土山溝的流放的鬥爭史。毛澤東扮演了一個先知的角色，但人們對他的預言重視得太晚，以至未能早日獲取勝利。這樣，毛澤東似乎獨自開拓了革命，以至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成了他個人的勝利，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也就成了他的傳奇。毛澤東甚至比列寧更加具有革命性。革命的命運就是他的命運，革命的實現就是他的自我實現。當我們進入自己設計的角色時，我們都成了自己虛構的東西。而毛澤東與大多數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經歷與歷史本身一致。毛澤東擔心勝利以後國內出現停滯和倒退，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相反，他確信只要歷史是永恆的，革命本身是永恆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業績永存下去。

在國內戰爭即將獲勝之際，毛澤東對革命的成敗變得關心起來。1949年勝利前夕，他就覺察到了權力可能會破壞他的同志們的革命純潔性。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sup>2</sup>

勝利把一代革命者從中國的農村帶進了資產階級的大城市；由於鬥士變成了官僚，幹部和群眾疏遠了。「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sup>3</sup>勝利也使共產黨員們鬥志鬆懈，認為他們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和打敗武裝的敵人的鬥爭終於結束，雖然毛澤東堅持認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sup>4</sup>

朝鮮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國內的動員運動，充分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和黨的熱情，暫時減輕了毛澤東對革命出現倒退的憂慮。但在1956年2月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之後，這種憂慮又恢復了，而且益發強烈。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社論可能是毛澤東本人撰寫的。社論警告說：「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sup>5</sup>毛澤東此時再次強調勝利尚未完全確定，必須繼續進行階級鬥爭。

1957年2月，他宣佈說，在中國，「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sup>6</sup>

毛澤東主義者後來常說，劉少奇副主席認為在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不再需要搞階級鬥爭了，毛主席的這番話就是針對他那時的謬論來的。<sup>7</sup>但這是一種事後的說法。使毛澤東憂心忡忡的直接原因，是東歐的動亂。假如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主義制度能如此輕易地就被動搖，中國的情況又會怎樣呢？

毛澤東對這種危險的感受因他對朝代興衰具有特殊的歷史意識而增強了。例如，他在國內戰爭年代後期提及的「糖衣炮彈」（糖彈），就是有意地與當時所謂的「劉宗敏思想」的錯誤聯繫起來。1644年，劉宗敏是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1606–1645）手下的一位聲名狼藉、貪得無厭的將軍。李在北京城外打敗明軍之後，他的軍隊在劉宗敏將軍指揮下開進京城。由於他們掠奪拷打居民，危害了人民對新王朝的支持。清朝軍隊很快就將李自成從京城趕走，建立起他們自己延續較久的王朝。1944年，詩人郭沫若發表了一篇論李自成的文章；在他看來，這支農民起義軍和紅軍之間顯然存在著可以相比的情況。如果共產黨人像李自成的人一樣，進入首都只是為了趾高氣揚地把所控制的財富裝滿自己的腰包，那麼他們的「王朝」就可能恰像李自成的一樣短命。不久，毛澤東也接受了這個思想，他在一次講演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sup>8</sup>

同樣，毛澤東（他少年時代崇拜像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那樣的英雄）<sup>9</sup>也必然地要將他的成功與一位開國君主的成功聯繫起來。像這樣的君主一樣，他也必定意識到，永遠保持勝利的成果是困難的。即使毛澤東自己未做這樣的聯繫，黨內其他人也會這樣做的，

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將毛澤東和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相比較。秦始皇的統治垮台，就是由於他對人民勒索過重。<sup>10</sup>毛澤東所受的正統教育(這使他接觸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他在孩提時就已熟記的豪傑人物小說，喚起了他頭腦裡的中國人皆有的這種朝代循環的意識。<sup>11</sup>《三國演義》開篇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紛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併入於漢。」<sup>12</sup>毛澤東並非擔心他的「王朝」會同樣衰落。但中國統治王朝的接續和為它們編寫的朝代史確實給人以這樣的啟迪：所有的政權在它們的開創者的熱情鼓舞下，都有一個生氣勃勃的開端；結果，又都因政治遺產被繼承者揮霍殆盡而歸於衰敗。<sup>i</sup>

當蘇聯由於允許工廠按照葉夫謝伊·李伯曼臭名昭著的市場制度來管理，由於放映好萊塢電影(「美國的精神鴉片」)，或由於讓「資產階級學閥」壟斷大學，將考試分數當作允許深造的唯一標準而似乎背叛了革命時，這種歷史現象必定顯得更加普遍了。<sup>13</sup>「在蘇聯，形成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它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整個國家迅速改變顏色。前車之覆，須引以為戒。」<sup>14</sup>

1962年1月，毛澤東告訴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者們，為了保證自己的黨不變修，黨必須更加全心全意地遵循群眾路線。「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總之，讓人講話，天

---

i 後來，林彪也強調了王朝的衰敗和修正主義之間的聯繫。1966年，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林「從我國歷史上來看」，考察了資本主義復辟問題。他說：「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很多。」隨後他援引了秦、隋、元、清等朝代為例，也提到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奪取了政權。「這些歷史上的反動政變應當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我們奪取了政權十六年，我們無產階級的專政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見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引自Marton Ebon, *Lin Piao: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China's New Ruler*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0), p. 255。

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sup>15</sup>大約在同一時間，毛澤東也開始強調在中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sup>16</sup>

到1963年5月，毛澤東已經感到，如果忘記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反革命復辟就會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法西斯黨。<sup>17</sup>事實上，黨本身也許已經成為這種復辟傾向的主要根源。

又過了十八個月，毛澤東進一步將黨內的這種傾向說成是「資本主義道路」，並將像劉少奇這樣的黨的「右派」稱為「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sup>18</sup>到1965年秋天，這位主席問他的中央委員同事們：「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是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sup>19</sup>最後，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在一個通知裡竟然說：「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過去，毛澤東曾多次認為黨員需要接受再教育。<sup>20</sup>但進行再教育的這些整風運動基本上是組織內部的悔過自新，而不是從黨外發動的思想革命。現在，毛澤東突然斷定反革命迫在眉睫，他勇敢地和自己的黨對抗，彷彿它是一個敵對的政權。毛澤東聲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sup>21</sup>他求助於社會本身，希望動員起輿論支持自己，而不必進行一場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清洗。毛澤東的這種重視輿論的傾向是由三方面的影響造成的：對中國傳統的研究，使他強調為了「革新人民」（新民）而從道德上來激勵他們的必要性；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的訓練，使

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敏感起來；國內戰爭年代使他懂得了動員群眾的重要性。

最後一方面的影響無疑是最具決定性的。但第一方面的影響，即毛澤東對傳統的研究，表明他相信道德拯救是有歷史淵源可尋的，以及他在人民共和國所搞的那套社會思想灌輸，也是有前例可援的。試將清朝的「鄉約」制度和毛澤東的「街道公約」加以對比，也可以發現在表面的相像之下有著重大的區別。

「革新人民」（新民）的思想也就是通過精神鼓勵來創造「新人」。這至少是毛澤東在1917年創立新民學會時的宗旨；當時，他在長沙還是一名學生。「新民」這個名稱直接受較早的一份改良主義的雜誌——《新民叢報》的啟發而來，該雜誌由毛澤東早年崇拜的英雄之一梁啟超（1873–1929）編輯。但「新民」這個詞的起源卻要古老得多。過去中國學生都要死記的《四書》之一——《大學》的開頭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sup>22</sup>，在止於至善。」<sup>23</sup>對大多數儒家學者來說，這段話強調的是，有教養的人的責任是做道德上的楷模，以激勵遲鈍的大眾。不過，在傳統的做法上，也還設計有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思想灌輸形式來革新人民的制度。明朝（1368–1644）大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9）發明的「鄉約」制度就是其中之一。1518年，王陽明在江西南部地區鎮壓起義時創立了鄉約制度，它企圖用誘使起義者回到文明社會的辦法使他們平復下來。鄉約本身反映了這樣的想法：邪惡是因世風日下產生的一種反社會行動。雖然官吏們的主要責任是在人民中維持「禮」，但是如果不與地方團體的成員們來分擔這一任務，官吏們就無法獲得成功。王陽明實際上是試圖組織起一系列強化道德的團體，因為幾乎無人有能力能夠改造他們自身。訂立鄉約的地區的居民們應推選出「約長」，來記錄他們的日常行為。個人要為每月的宴會捐助財物，每次聚會，擊鼓如議，眾人大聲發誓：

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sup>24</sup>

然後，對每個成員在過去一個月中的舉止行為進行瑣細的討論。好的行為備受讚揚，壞的行為遭到批評，惡人被迫跪下，當眾認錯。反覆強調聚會的根本目的，不是懲罰人，而是改造人。在發現有人做了壞事時，人們盡一切努力來幫助當事人，而不是把他移交司法當局了事。

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sup>25</sup>

鄉約制度在明朝末期消失了。但在十七世紀中葉的動亂之後，清朝(1644–1911)第一個統治者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頒佈「六諭」<sup>26</sup>「教化民眾」，重新施行了鄉約制度，<sup>27</sup>其原因一半是為了恢復文明社會，一半是為了維護自己王朝的長治久安。每個社團從它的生員(通過最低級別考試的人)和德高望重的長者中選出一位約長，負責解釋這些條諭。約長和他的副手每月兩次召集居民們宣讀「六諭」，敦促人們孝敬長輩，教育後代，鄰里和睦，安居樂業，勿犯罪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鄉約制度逐漸變得更為精細。1729年，被委任來幫助頭頭宣講皇諭的副手多達三個以上，各處專門宣講皇諭的地點被稱作「講約所」。而且，早先的「六諭」被大大擴充了。早在1670年，康熙皇帝入情入理地詳述了十六條「聖諭」。他在「聖諭」中不是告誡中國百姓要「對父母盡孝之責」，而是命令他們對社會事務給予應有的重視，真誠履行孝悌之義。「聖諭」所期望的德行要達到的社會目的，是用各種實例來說明的。鄰里和睦相處是為了防止紛爭，講究禮儀是為了守好規矩，學校將得到發展，謬說則遭到受尊崇的學問的抵

制，等等。首先特別要強調的是，人們應安於各自在社會中所處的生產地位。崇尚節儉，積蓄錢貨，克奉職守，解決人們的要求。這樣，帝國的全體臣民就被分成順民和刁民兩類。皇帝正是依靠前者來闡釋法律，警誡愚頑之徒，並作為文明社會與其棄民之間的調解者來發揮作用的。

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對社會秩序更為關心。1724年，他發佈了詳盡的教諭。在洋洋萬言的勸誨中，他設想上天已為各人做了合適的安排，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是每個人的職責。「而若人皆安於職守，孜孜以求，則何事患不成。」這種語調聽起來更像是一個父親的口吻，而且在城市繁榮富強時期是適宜的，它們聽起來好像就是基佐(Guizot)在《靠自救還是靠天助》或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在《自助論》中所表達的資產階級的一些言論。

如果你認識到，朝廷日夜憂心和操勞的除民事外無他……即使在付了公私稅款和税金之後所剩無多，你也還能夠通過日積月累，逐漸使自己和家庭過上富裕的生活，為兒孫留下可供繼承的財產。<sup>28</sup>

因此，皇諭對社會的基本單位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家庭應遵守秩序，個人應自主上進。等級制家庭和有進取心的個人之所以受到這樣的鼓勵，是因為他們對政府依賴順從，就如同想往上爬的官僚對皇帝那樣。社團自治和自由結社是被禁止的，因為放任自流和平等主義的社團在封建藩籬之內是非法的，這樣做會被認為是有意違法。「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幹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懲捕株連，身陷圖圜。」<sup>29</sup>這些秘密團體的成員之所以必須被剝奪其公民權，受到懲罰，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意願與集體對立，而是因為他們在一起陰謀反對政治傳統和父權制社會。

清朝的鄉約制度在十八世紀末終止。雖然十九世紀的官員如曾國藩(1811–1872，為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所敬重的湖南政治家)等曾偶爾